

第一节由“甲午”国耻引发的 汉语拼音运动和国语运动

汉民族共同语向标准语的发展要从上一世纪末，也就是清末的三大语文运动说起。三大语文运动指的是对中国的社会发展，文化发展以及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具深远的意义的切音字运动、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它们的共同目的是改革语言文字，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现代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之所以叫作运动，那是因为语言文字关系到整个社会、整个国家，这种变革在当时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在这三个语文现代化运动中，切音字运动是提倡汉字改革，创制拼音方案的运动；国语运动是推广汉民族共同语口语的运动；白话文运动是提倡用能够表达口语的白话文取代言文作为正式的书面语的运动。它们密切相关，相辅而行；但是就历史渊源关系而言，国语运动却是从切音字运动，即汉语拼音运动中引发出来的。这一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闯将，在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新文学运动、古史辨运动等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钱玄同，在《注音字母和现代国音》（1922）中表述得很清楚：

“1894年（甲午）中国给日本打了一次败仗，于是国中有识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于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个问题发生，则汉字形体之难识、难写是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当1908至1911（戊申至辛亥）这四年中，推行简字（按，指拼音新字）以谋求普及教育的运动，日盛一日，几乎有通行的希望……民国成立以后，教育部继续清末的简字运动，设读音统一会，打算先定国音，次制字母。这字母既可注于汉字之旁，作统一国音的工具，又可独立施用，作普及教育的利器。”

钱玄同的话既交代了切音字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也指明了国语运动是如何发生的。国语运动的另一个倡导者、组织者黎锦熙，

在《国语运动史纲》（1943）中，也把切音字运动看作国语运动的前期。因此，我们也打算由此入手；从字母和语音的角度，对切音字运动作一点简明扼要的阐述。这对了解国语标准音的确立、国音字母的产生以及后半世纪的汉语规范化运动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都是十分必要的。

* * * * *

切音字中的“切音”就是拼音的意思，所以切音字就是拼切语音的字母，切音字运动产生的历史渊源可以远溯至明末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他第一个创制了用罗马字（即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方案（1605），其后又有金尼阁的汉语罗马字注音方案。而鸦片战争（1840—1842）之后，外国来华传教士制订和推行的各种拼写汉语方言的教会罗马字方案开始大量出现。这对清末的切音字运动当然是有影响的，它使前期各种拼音方案的字母形式大都采用了罗马字。但是激发中国社会产生切音字运动的直接原因却完全不是这种为了帮助教徒阅读《圣经》的教会罗马字，而是钱玄同所说的“甲午”国耻。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了赔偿二万万两巨额军费，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割让辽东半岛（辽宁东南部）、台湾、澎湖列岛的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时，朝野震惊，激发了社会民众特别是有进取精神的知识分子的爱国天良，大家推究中国失败的原因，觉得洋人、日本人之所以强盛是因为他们“民智早开”，“人人能读书写字”。之所以如此，则要归功于他们的文字简便、易识、易写、易记，因而教育容易普及。反观汉字，则难识、难写、难记，“为天下之至难者”。大家由此得出结论：“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家断不能富强。”于是，各界人士大声疾呼要改革汉字，纷纷起来创制简单易学的“切音新字”。清末的切音字运动就这样兴起并迅速发展起来。

事实上，创制“切音新字”、“切音快字”在形成热潮之前，政治、文化领域的思想革新已经开始了。因为自从鸦片战争后，中国屡遭世界列强的侵略凌辱，政治文化领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汉字

神圣不可侵犯的崇高地位也已经受到了激烈的挑战。钱玄同在《汉字革命》（1923）一文中说：明目张胆声讨汉字罪恶的人，最早的是当时被称为“思想界之彗星”的谭嗣同。他大概是第一个主张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人，而第一个提出各种拼写方言的拉丁化拼音方案的人则是卢戡（zhuàng）章。他的《一目了然初阶》（切音新字厦腔）早在甲午之战前两年就问世了，因此他被称为“从事切音运动的第一人”。

我们想简略地介绍一点卢戡章从事切音新字的思想基础，因为从中可以看到贯串在整个切音字运动中的一根红线，同时还可从中领悟到它后来怎么会引发了国语运动，并与之相辅而行的。

卢戡章是福建人，二十一岁便去新加坡专习英语。那时，福建一带西洋传教士很多，他们用罗马字母创制了一种“话音字”，拼切方音土语，刊行圣经；不识字的老百姓学会了“话音字”，就可以自己阅读圣经。卢氏从新加坡回厦门后，悉心研究这种话音字，增改修订，历时十余年，在罗马字母的基础上自己设计了一套“中国切音字母”，可以用来拼写厦门、泉州、漳州、福州、广州以及官话等多处的“话音”。这里我们只想提醒读者注意他在一篇《切音新字序》（1892）里说的一些话，他说“……凡字无师能自读；基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遂即达于心，又基于字画简易，则易于著笔，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这一段话里提到的“字话一律”的思想，说明切音字运动从一开始就已经注意到“汉字革命”不仅仅是一个文字繁简问题，切音新字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拼切的是“说话之音”，是一种“话音字”。所以，从“字话一律”到后来国语运动中的“言文一致”，显然是一脉相承的。卢氏所说的“字画简易”当然是相对于汉字形体繁难而说的，所以后期的切音字运动又叫“简字运动”，劳乃宣的拼音方案，就叫《简字谱录》。创制切音字要求“字话一律”“字画简易”，是为了“普及教育”，为了“国之富强”，这是贯串在切音字运动以及国语运动中的一根红线。

卢戡章在《切音新字序》中也触及了语言统一问题，他说：“……十九省之中除广（东）福（建）台（湾）而外，其余十六省，

大概属官话(？)。而官话之最通行者，莫如南腔。若以南京话为通行之正字，为各省之正音，则十九省语言文字既从一律，文话皆相通，中国虽大，犹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对面无言也。”这里提到的“正音”、“语言文字既从一律”、“文话相通”等显然都已超出了汉字改革的范围，涉及民族语言的发展了。

卢氏在 1905 年曾把他的著作《中国切音字母》向清政府学部呈缴，学部审议后认为，“造中国切音字母以济象形文字之穷，”应该根据传统音韵学中“三十六字母的本音”稍去其微妙难辨者，然后制定若干标准声母，同时按照传统音韵学中的“四呼”（指开齐合撮）四收（指收尾的舌齿音 *n*、舌根音 *ng*、唇音 *m* 以及被统称为“喉音”的其他韵尾）制定若干标准韵母。但是，清政府学部认为：卢氏的“中国切音字”一是声母不完全，三十六字母中的十七个浊音，只有三个；二是韵母无入声；三是“写法乖谬”，先写韵母后写声母，“与古今中外通例相背驰”。学部审议的结论是卢氏的中国切音快字，“不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谋教育之普及……自难用为定本，通行各省。”卢慧章的切音方案就这样被清政府学部批驳了。

用今天的眼光看，清学部用唐守温三十六字母，用传统音韵学的音韵系统来审议卢氏切音新字的语音，自然是不合理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学部最后的着眼点是“不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不能通行各省”。可见，想消除各省、各地区的方言隔阂，统一语言已是当时社会上下一致的共识了。因此，后期的切音字运动发生了两个变化：一是字母形式由以拉丁字母形式为主转而以汉字笔画式为主；一是切音方案由拼写各地方言逐渐发展为以拼写官话为主。其中以王照和劳乃宣的方案传播最广，影响最大。

王照是河北人，他的切音字方案叫作《官话合声字母》（1900），拼写的是官话音，字母形式完全摹仿日本的片假名，采用汉字中的某一部分作为字母。例如，以“璞”字的偏旁“扌”表示 *p*，以“五”的下半部“廾”表示 *u*，以“阿”的首笔“丿”表示 *a*。王照的切音字方案声母多达五十个，而韵母却只有十二个，因为他采用声介结合的双拼法来拼切字音，连 *i*、*u*、*ü* 也列入声母的

范围。这样，韵母系统中也就没有了由 i、u、ü 开头的一系列的复合韵母，只有十二个他称之为“喉音”的韵母。王照终其一生始终极端反对三拼法，他认为“学三拼较学双拼其难数倍”，为学习者着想应该采用双拼法，所以始终不听别人批评官话合声字母数目太多的意见，固执地认为“文人但争理论以饰听闻，不可与言也！”

王照的合声字母在当时通行极广，影响几乎遍及全国。因为，他的字母是汉字笔画式的，适应中国的文化传统，容易得到社会的认同，而字母拼写的语音又是当时官话中影响最大的“京城口声”（北京口语）迎合当时已经开始突现的统一全国语言的社会潮流。同时，合声字母又得到许多朝廷大员，如管学大臣张百熙，翰林院编修严修，桐城派古文领袖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等的积极支持。这样，许多地方都在省城设立了大规模的“简字学堂”，传习官话字母。有的地方如河北直属京师的直隶提学司甚至将官话字母加入师范及小学课本。一个时期，“由京津而奉天，而南京，官话字母遍及十三省”。这就是钱玄同在《注音字母和现代国音》中所说的，当时“推行简字以谋求普及教育的运动，日盛一日几乎有通行的希望”。其时，王照本人也亲自参与作了许多实际工作，如办“拼音官话书报社”刊行出版了许多拼音官话书报，还创办了“官话字母义塾”，请他的学生王璞出面教授传习。官话字母推行将近十年之久，最后却因他办的“拼音官话报”，不慎触犯了宣统皇帝的父亲、摄政王载沣的忌讳，于是报社被封，官话字母也被严禁各省传习。王照的事业毁于一旦，他痛心疾首，哀叹“十年苦心，付之东流。”

但是，切音字运动在当时毕竟已经成为一种得到广泛支持的社会事业，因为许多人认定它可以“开民智而救大局”。所以继王照之后，另一种切音字方案——劳乃宣的“简字”就起而代之。但是他在王照的官话合声字的基础上，“略加增删”而编就的《简字全谱》其社会影响却远不如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劳乃宣虽蒙慈禧召见，进呈了一部《简字谱录》，慈禧也做了让“学部议奏”的批示，但学部却始终“置之不议不奏”。劳乃宣两次上折，请求“从速集议”学部仍是不议不答。之所以如此，据黎锦熙在《国语

运动史纲》中的分析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清政府学部内一些保守的封建顽固分子害怕简字一旦通行会危及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封建文人赖以安身立命的汉字的根本地位。另一个原因却在劳乃宣《简字全谱》本身，因为他的全谱，包括《京音谱》（与王照同）、《宁音谱》（南京话）、《吴音谱》、《闽广音谱》共一百一十六母，二十韵，涵盖了大部分方言，而且他还主张“南人先就南音各谱学习，以便应用；学成之后，再学京音，以归统一。”劳乃宣自己把他的主张称之为“引南归北”。但这显然与当时要求“统一语言”，“言文一致”的社会趋势是相背的；所以，学部便以“分裂语言”有碍统一为理由，始终把劳乃宣的简字拼音方案搁置不议。

上面我们之所以把王照和劳乃宣从事切音字运动的经历做了一点极其简要的介绍，其着眼点仍在民族语言的发展上。因为王照和劳乃宣，一个“成功”，一个“失败”，其原因实质上还是一个语言问题。王照把握住了民族语言的发展趋势，而劳乃宣却没能认识到这一点。其实劳氏并不反对全国语言统一，他只是主张先让各方言区的人做到地区性的言文一致，然后才是全国语言统一，也就是“南人先就南音简字各谱学习，以便应用；学成之后，再学京音，以归统一”。但当时语言发展的历史事实是北京官话已经脱颖而出，成为一种优势方言，北方官话已经成为一种民族共同语。在这个问题上洋人的认识反倒比中国人要早半个多世纪。1867年出版的，当时已成为世界各国在华使馆共同采用的学习汉语的课本——《语言自迩集》（伦敦出版）的作者威妥玛（1818—1895）在该书第一版的序言中曾经写下了这样一段史实，即19世纪的四五十年代，外国人是不能在北京设立使馆的。1864年，外国公使先后获准在北京设立使馆后，他们很快发现此前他们学习的南方官话，即南京官话已经过时了。为了更好地与清廷官府打交道，为了“外交上的需要”，他们必须学习“帝国宫廷语言”。这种“帝国官话”就是“净化它的土音的北京话”。他说：“自从带有许多学生的外国公使馆在北京建立，不首先学习这种语言，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因为它比任何其他语言都更重要。”而且“据说北京话的特征正逐渐渗入官话通行区域的所有各地方言。”同时，日本的汉语教学也转向

了北京官话，因为“北京官话是中国全域的通用语”。

以 19 世纪中期的纯正的北京话作为语料的汉语学习课本——《语言自述集》及其序言证实：北京话经历了明清两代的发展，至迟在 1850 年之前已经获得了官话正音的地位，已经成为一种连外国人也认识到的民族共同语了。所以连最早设计了许多方言切音方案的卢戡章，他原先主张以南京音为正音，这时也赞同“颁定京音官话，以统一天下语言”。而劳乃宣却提倡，先让各方言区“言文一致”然后全国“言文一致”统一语言。难怪当时报上许多人提出批评说“照他的办法，将使中国愈远同文之治”骂他是“分裂语言文字的罪魁”。对照来看，王照却是认清了语言的发展趋势，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他早在《官话合声字母》序里就宣称：“语言必归划一，宜取京话，因北至黑龙江，西逾太行宛洛，南距扬子江，东传于海，纵横数千里，百余兆人，皆解京话……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官者公也，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王照的这一段话把汉民族共同语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说得何其透彻。也正因为如此，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得到清末桐城派领袖、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吴汝纶的支持。他向清政府管学大臣张百熙推荐《官话合声字母》，说“此音尽是京城口声，尤可使天下语音一律。”可见，吴汝纶的着眼点也还是在“语言统一”上，而国语运动的倡导者之一黎锦熙甚至认为“国语统一”这个口号可以说是由吴汝纶叫出来的（见《国语运动史纲》）。因为“国语”“普通语”这些名称都是由他在 1902 年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时，奉命考察日本文化教育后带回来的。吴汝纶在他的《东游丛录》中说，在日本考察时看到很多学校，尤其是师范学校都专门设立了“普通语研究会”，所谓“普通语”者即东京语也”。同时，日本的教育家、语文学家都向他宣传“国语”的重要意义，极力劝他提倡“国语”：“欲养成国民爱国心，必须有以统一之，统一维何？语言是也……察贵国今日之时势，统一语言尤为急急者。”用什么办法统一语言呢？那就是“设立师范学校，教师范生学习国语（东京语）归而传授。”日本教育家说他们就是用这个办法解决语言障碍的，而三十年前他们有些不同地方的人“对面不能通姓名，

犹如贵国广东福建人之见北京人也。”所以，他们十分重视学习国语。在学校的课程设置中“宁弃他科而增国语”。同时还认识到“国语的重要性，犹今世之新发明也，”因为“其足以助团体之凝结，增长爱国心也。”这些话对当时中国国内因“甲午”国难而激发起来的要求普及教育、团结民心、救国图强的社会思潮是十分切合的，无疑在吴汝纶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于是，吴汝纶从日本考察回来后就上书管学大臣张百熙，向他提出推行王照的《官话字母》实现国语统一的主张，张百熙就跟张之洞等人一起奏定了《学堂章程》（1903），其“学务纲要”第二十四条特作如下规定：

各国语言，全国皆归一致，故同国之人，其情易洽，实由小学堂教字母拼音始。中国民间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多扞格，兹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

用现在的话来说，从此学习官音，统一语言成为政府行为。其实早在清雍正六年（1728），皇上就因为听不懂闽广两省官员的陈奏，亲自训谕福建、广东两省督抚成立正音书院，专门教授官话：“朕每引见大小臣工，凡陈奏履历之时，惟有闽广两省之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赴任他省，又安能宣读训谕，审断词讼，皆历历清楚，使小民共晓乎？官民上下语言不通……事理之贻误多矣……应令福建、广东两省督抚……多方训导，务使语言明白，使人通晓，不得仍前习为乡音。”（转引自《国语运动史纲》上卷 26 页）但清中叶以后，这件事慢慢没人管了，而现在则要更进一步在学校设立科目，传习官语，要把它推广到老百姓中去。其后几年，地方上也主动开展了学习官话，统一语言的宣传，主调仍是“……要救中国，先要联合中国的人心；要联合中国人的心，先要统一中国的言语，这才是变弱为强的下手第一着。”而清政府其实是重操旧业，适应时势，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由此，“国语”这一名称也开始正式在官方文件中得到使用。到了 1911 年，学部在“国语教育事业”五条中进一步规定，到宣统八年，也就是 1916 年，“检定教员须考问‘官话’师范、中学、高小各项考试均加官话一科”（

引自《国语运动史纲》，31页）。有意思的是清学部始终不提慈禧太后批示过的要“学部议奏”的劳乃宣的合声简字，而把“简字”更名为“音标”，并审定“音标”用法有二：一、拼合国语，以开中流以下三亿几千万不识字之民智，而合蒙藏准回二千万里异语民族之感情；二、范正汉字读音，学校课本每课生字亦须旁注音标”（转引自《国语运动史纲》上 32页）。学部的这个议案，经清政府中央教育会议公决并通过一个“统一国语办法案”，甚至想在宣统八年普及国语。但是，清政府万万没有想到宣统根本到不了八年，而只有三年。1911年10月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从此被彻底埋葬，这样当年六月才公决并通过的“统一国语办法案”也就成了一纸空文。国语运动实际上是由后来的国民政府开展起来的。

第二节 中国第一套法定的拼音字母 —— 国语注音符号的诞生

清末政府的学习官音，统一语言的号召，只是给国语运动起了一个头，实质性的工作，可以说一点也没有开展。但重要的是把确立民族共同语标准音的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所以国民政府一成立，教育部就召开了会议，议决改“切音”为“注音”，采定注音字母，审定一切字音的法定国音，准备从统一汉字读音入手来统一全国语言。紧接着第二年（1913）就召开读音会统一会，正式采用了“国语”这一名称。

按照事先议定的工作程序，第一步是审定六千五百多字的国音。审音办法是从清朝音韵学家李光第《音韵阐微》中选取各韵之常用同音字，分发给各省与会代表，分省用会上准备的暂定的“记音字母”注上应读之音，然后开会表决，“以多数为会上审定之读音”。第二步是“核定音素 采定字母”。但正式开会时却对审定字音的工具——大会事先准备的暂定的“记音字母”发生了争论，争论的焦点不是字母形式，而是语音问题。因为江苏、浙江两省的会员声称：南方人离了三十六字母中的十三个浊音（並 [b]、奉 [v]、微 [m]、定 [d] 澄 [ɕ]、娘 [ŋ]、从 [dz]、邪 [z]、床 [dʒ]、禪 [ʒ]、群 [g]、疑 [ŋ]、匣 [ɣ]）便过不得日子。因而坚持要把十三个浊音字母加入大会暂定的“记音字母”中去，否则无法审定字音。而王照、王璞等北方各省会员却认为“字母加入十三个浊音”，那是“以苏浙音为国音”，这是断然不能同意的。双方争论激烈，相持三十多天。后来王照（会议副议长）、王璞等人召集了北方十几个省以及川、滇、闽的代表别开一会，共同商定了一个新提案，读音统一会上的表决“应以省为单位，每省不问会员多少，只有一（票）表决权。”并且相约如果这个提案通不过，则“吾辈各省会员自行解散！”这样一来，苏浙会员将由多数转而变成少数，十三个浊音肯定通不过。会议议长吴敬恒是南方人，对这个

新提案，“三日未付表决”，事情于是一直闹到教育部长那里去了。部长为了顾全大局出面调停，这个提案终于通过。但是，根据劳乃宣的意见，仍然保留了“兀”[ŋ]，“万”[v]；“广”[ɰ]三个浊音声母以及入声、尖团音等几个东南方音的特点。“记音字母”问题一解决。六千五百多个字音的审定，也因每省只有一票表决权得以顺利通过。后来1919年的初版《国音字典》（商务印书馆）的注音，就是以此为依据的。

第一项工作完成后，会议进入第二项议程：“核定音素，采定字母”。在采用何种字母的问题上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因为会议征集到的和调查来的各种拼切语音的字母，有西洋字母式的、汉字偏旁式的，速记式的，豆芽式的，图画式等等。字母形式五花八门，各种各样都有，而且“人人都想做仓颉”（吴敬恒语）坚持要大会通过自己的方案。再加上“意气之争，方域之见”，争论又趋于白热化，几乎要打起来。最后是根据当时在教育部任部员的周树人（鲁迅）和浙江会员马裕藻的提议，把大家在审定字音时共同采用的暂定的“记音字母”作为正式采定的字母，并根据民国元年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通过的“采用注音字母案”正式定名为“国语注音字母”（后，1930年改称“注音符号”）。于是，历时三个多月的读音统一会正式闭会，历史上第一个由政府部门法定的国音（标准音）及其标记符号，国音字母就这样产生了。

现在看来，读音统一会上发生的问题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比如，审定字音的“记音字母”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大家对“统一国语”的标准音还缺乏明确的认识。但是，为民族共同语确定一种标准音，这是一个新的历史课题，要经过实践、探索才能明确的，所以发生争论，甚至争吵，也并不奇怪。这个问题我们在下面还要谈。现在先对注音字母的创制作一点介绍和分析，以便大家对它有一个更深的历史的认识。

据当时的反映，教育部读音统一会上原来是暂时使用的“记音字母”，最后竟被确定为正式的国音字母，实在有点出乎大家的意料。因为这套记音字母的创制者章炳麟，他不但不是读音统一会成员，而且还是一个切音字运动的反对者，写过一篇《驳中国改用万

《国新语说》（1908）的文章，他对当时各家所造的拼音简字都不满意，自己根据反切的原理加以改订，创制了一套“纽文”（即声母）和“韵文”（即韵母）。他说这套纽韵文“只在笈识字端，令本音画然可晓，非废本字而以切音代之。”也就是说跟其他切音字创制者不同，他是反对用拼音字母取代汉字的。那么为什么反对切音字运动的章炳麟的纽韵文反而在切音字运动者聚集的读音统一会上压倒了各种方案成为法定的国音字母呢？就当时会议上的情况说，各种切音方案大体上可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罗马字母式的，第二类是仿日本片假名的汉字偏旁式，第三类是符号式的，他们自定符号以为字母。这三类方案各有长处，难分轩轻，无从偏采哪一种，所以僵持不下。而章炳麟的纽韵文在当时社会上虽然影响不大，却不属于上面所说的哪一类，哪一派，他自成一格，“定纽文为三十六，韵文为二十二，皆古文篆籀径省之形，以代旧谱”，所以被称为简单汉字派。在当时旷日持久，争执不下而会议结束期限又将至的情况下，章炳麟的这套纽韵文最容易为各方接受。而从切音字运动的发展来说，它的后期字母的形式已由拉丁字母式转向以汉字笔画式为主，而章炳麟的纽韵文，其字母都是笔画简单的篆体古文（即“古文篆籀径省之形”）。例如，以篆文“𠄎”（古“刀”字）代表声母 d，以篆文“𠄎”（古“七”字）代表声母 c，以“厶”（古“私”字）代表声母 s，以篆文“×”（古“五”字）代表韵母 u 等等。这种独体汉字的字母形式比之汉字偏旁式更容易迎合大家文化认同的心理。因为它“有典有则，有本有源”，洋（就拼音的角度说）而不失汉字之本“宜于今而又不悖于古”。此外，章炳麟当初创制这一套纽韵文，虽然是为了反对有些切音字运动者，最终想用切音简字取代汉字，革汉字命的主张。但是他的“切音之用，只在笈识字端令本音画然可晓的主张”恰恰跟读音统一会“采定字母”为汉字注音的目的是吻合的。所以切音字运动中冒出来的各种切音字方案，包括社会上已经十分通行的官话合声字母都落选了。而惟独这一套纽韵文被选中了，推究起来，其实也并不是什么偶然的事。

读音统一会闭幕后，根据会上议决的“国音推行方法”，请国民政府教育部将大会上修改采定的国音字母从速核定公布，并做了

“中等师范国文教员及小学教员必须以国音教授”；“小学校课本一律汉字旁添注国音”等规定。但当时政府部门中封建守旧势力还相当强大，始终害怕注音字母一旦公布并推行，将“有妨固有的汉字”危及汉字的根本地位，而且认为“用以注音也无法保障（语言）统一”。因此，教育部把全案都搁在文书科的柜子里，一搁就是五年，一直到 1918 年（民国七年）才迫于国语研究会一千多名会员的请愿以及当时的社会形势，正式公布了注音字母。

第一次由部令正式公布的注音字母表，也并不是全套照搬章炳麟的纽韵文，而是按照他的原则和方法重新制定的。钱玄同在《文学字音篇》第五章“注音字母”中说：“注音字母三十九母，皆取笔画甚简之汉字，而用双声叠韵方法变读其原来之字音。如‘ㄍ’，原音‘桧’，今读如‘哥’。‘ㄒ’，原音‘夏’，今读如‘希’。‘ㄐ’，原音‘节’，今读如‘兹’之类。此声母用原字之双声而变其音读者也。‘ㄐ’原音‘诃’，今读如‘阿’。‘ㄑ’原音‘汪’，今读如‘尪’。‘ㄒ’原音‘亥’（即‘亥’之古文）今读如‘哀’之类。此韵母用原字之迭韵而变其音读者也”。如果对照“纽韵文”，可以看到注音字母三十九母，其中只有十五个是直接取自章炳麟，其他的都略作了修改。因章氏的字母是篆文，改成楷体后，不少字母跟普通汉字容易相混，有的甚至于完全一样了。例如，注音字母的“ㄊ”，章氏用的古“突”字篆体“𠂔”，楷写就变成“土”字了。注音字母表中音类排列的次序和说明也都反映了中国传统音韵学的影响，以头六个字母为例：（详见本节附录“注音字母与古字音义对照说明”）

ㄍ（见一）古外切，与浚同，今读若格，发音务促，下同。

ㄒ（溪一）苦浩切，气欲舒出，有所碍也，读若克。

ㄐ（疑）五忽切，兀高而上平也，读若愕。

ㄑ（见二）居尤切，延蔓也，读若基。

ㄒ（溪二）本姑兹切，今苦兹切，右吠字，读若欺。

ㄊ（娘）鱼检切，因崖为屋也，读若臑。

罗列这六个字母，为的是显示一点注音字最早的历史面貌，让大家

十七个（不算万、兀、广、巾），因为它把ㄨㄨ独立出去，用的是声介韵三拼法。这样，注音字母除了ㄉ、ㄊ、ㄋ、ㄌ、ㄍ、ㄎ、ㄑ、ㄒ、ㄓ、ㄔ、ㄗ、ㄘ、ㄙ、ㄥ八个韵母之外，其他的实际上都是音素字母了。所以，声介韵三拼法是声韵双拼法和全音素拼写法之间的过渡形式，是对汉语拼音方法的重大发展，而且使大家有了现代的音素的概念。结合韵母虽然未经部令公布，但是在国音字母的传授、教学中以及经教育部审定的国语留声机片课本中都是排列在韵母表中的。

注音字母正式公布后，注音字母发音原理的介绍，字母音值的说明，拼音方法的传授，国语的学习使国语运动开始蓬勃发展；同时，因此产生了一门新的学科——国语发音学（国音学），而 20 世纪的中国语音学就是由此发端的。

本书附录注音字母与古字音义对照说明

注音符号与原字音义的对照
(转引自徐世荣、孙崇义《注音符号讲话》)

ㄩ	ㄩ	古「包」字，念ㄩㄠ，表示包裹的形状。
ㄨ	ㄨ	古「扑」字，念ㄨㄞ，表示手拿着东西轻轻地打。
ㄩ	ㄩ	古「扉」字，念ㄩㄟ，表示用手巾掩盖着。
ㄩ	ㄩ	念ㄩㄠ，表示放东西的箱柜。
ㄩ	ㄩ	「万」字的简体。本念ㄨㄞ(现念ㄨㄞ)。
ㄩ	ㄩ	古「刀」字，念ㄨㄠ，表示刀的形状。
ㄩ	ㄩ	古「突」字，念ㄨㄞ，是把「子」字倒写来表示生孩子突出的形状。
ㄩ	ㄩ	古「乃」字，念ㄨㄞ，表示说话时嘴里呼出的气。
ㄩ	ㄩ	古「刀」字，念ㄨㄠ，表示人的筋络。
ㄩ	ㄩ	古「涇」字，念ㄨㄞㄨㄞ(现念ㄨㄞㄨㄞ)就是水沟。
ㄩ	ㄩ	念ㄨㄠ，表示气向上冲遇着阻碍。
ㄩ	ㄩ	本念ㄩㄟ(现念ㄨㄞ)，表示高而上平。
ㄩ	ㄩ	念ㄨㄞ，表示山旁的悬崖可以住人的。
ㄩ	ㄩ	古「纠」字，念ㄩㄟ，表示纠缠的样子。
ㄩ	ㄩ	古「畎(刚)」字，念ㄨㄞㄨㄞ，表示田间小沟的形状。
ㄩ	ㄩ	本念ㄨㄞ(现念ㄨㄞ)，表示山岸上盖着房子。
ㄩ	ㄩ	古「下」字，念ㄩㄟ，表示在下的地位。
ㄩ	ㄩ	古「之」字，念ㄩㄟ，表示草木往上长的意思。
ㄩ	ㄩ	古「蹶(脚)」字，念ㄩㄟ，表示迈步前进。
ㄩ	ㄩ	古「尸(屍)」字，念ㄩㄟ，表示人身仰卧的形状。
ㄩ	ㄩ	就是「日」字，念ㄩㄟ，最初这个字形是圆的，表示太阳。
ㄩ	ㄩ	古「节」字，本念ㄩㄟ(现念ㄩㄟ)，表示膝盖关节的形状。
ㄩ	ㄩ	就是「七」字，本念ㄩㄟ(现念ㄨㄞ)。
ㄩ	ㄩ	古「私」字，念ㄩㄟ画成弯曲的样子，表示自己只顾自己的利益。
ㄩ	ㄩ	「丫」又(「杈杈」的「丫」)，念ㄩㄟ，表示头上有两个杈儿。
ㄩ	ㄩ	古「呵气」的「呵」字，本念ㄨㄞ(现念ㄨㄞ)。
ㄩ	ㄩ	由「乙」分化出来，原来是在「乙」上点一圆点，后来改写一直通下。
ㄩ	ㄩ	古「也」字，念ㄩㄟ。
ㄩ	ㄩ	古「亥」字，念ㄨㄞ。
ㄩ	ㄩ	古「移」字，念ㄩㄟ，表示水流动的形状。
ㄩ	ㄩ	就是「么」字，念ㄩㄟ，表示胎儿细小的样子。
ㄩ	ㄩ	就是「又」字，念ㄩㄟ，古时当「左右」的「右」用，表示右手的形状。
ㄩ	ㄩ	念ㄨㄞ，表示花朵含苞未放。
ㄩ	ㄩ	古「隐」字，念ㄨㄞ，表示隐藏曲折的地方。
ㄩ	ㄩ	古「延」字，念ㄨㄞ，表示一个人伸了一条腿。
ㄩ	ㄩ	古「胫」字，念ㄨㄞㄨㄞ，表示胳膊的第二节从肘到腕的部分。
ㄩ	ㄩ	古「人」字，又是「儿」字的下半部「儿」念ㄩㄟ。
ㄩ	ㄩ	就是「二」字，念ㄩㄟ。
ㄩ	ㄩ	古「五」字，念ㄨㄞ。
ㄩ	ㄩ	念ㄨㄞ，是盛饭食的一种盆。

第三节 为寻求“中国语言的‘心’”而开展的“京国问题”大讨论 —— 国语标准音的最终确立

注音字母颁布之时，为现代汉语书面语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而发起的“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序幕已经由胡适的一篇《文学改良刍议》（1917）揭开了。第二年，他又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

“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以有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方才算得真正的国语。”

这里所说的要“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指的是要用现代白话创作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使中国文学“以白话为正宗”，所以“国语的文学”就是刘半农所说的“白话新文学”；这里所说的“文学的国语”从规范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应该指的是“文学语言”即影响较大的作品或作家提炼加工过的语言，这种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的语言是民族标准语的根柢和源泉。

胡适的话触及的一个根本问题是：白话文运动、切音字运动和国语运动都从普及教育、开发民智、拯救中国的高度来提倡语言文字的“革命”，但这些倡导者他们自己写的却都是文言。于是当时就有人说：如果始终没有优秀的现代白话文作品，没有一批优秀的“善作白话者”那么白话怎么替代得了文言 所谓‘言文一致’要么是一句空话，要么就只是对平民百姓和小学生说的话。

其时，国语研究会（1916年成立）的许多会员也逐渐感觉到了这个矛盾。他们在社会上热情推行国语，提倡言文一致，自己写的却都是“之乎者也”的文言，连书信往来也如此。国语研究会中第一个把白话文用于书信往来的竟是胡适 1917年年底从美国寄来的申请人会的一张用白话文写的明信片。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家从中得到了启迪 感悟到自己应该“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于是，